



# 纪念潘汉年同志

夏衍

二十七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材料、来往电报和大量的入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今年9月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事实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的文艺杂志《A11》<sup>①</sup>和主编了《幻洲》。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二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沒有见面的机会。当时，年轻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艺史学家都简单地把它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战，其实，这中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歧。当时，我们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赣粤一带节节胜利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要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开北的一次支部会上，洪洪群告诉我，他们说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和这之后一大段时间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什么样的作品，一直是有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先各自所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缺少的只决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定，应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列托利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做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普列托利答利亚文学者，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自己的批判的组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矛盾的批评（矛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枪铃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笙、冯乃超等同志都记得很清楚的。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沅等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的重视；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所以他有許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去的，他笑着说：“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党大会，十五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

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亚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我要出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她，潘收下后连谢谢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一直是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杏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关于这件事，1978年8月我写了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其中有几句话：“到上海后，他（杨）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

二十年代他在创造社工作，干的是据书稿、铅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叫他“小伙计”。到三十年代，他已经可以和杨杏子、杨度的名字大名对交过手，不知哪一个人把他取了一个代名叫“小开”。“小开”上海话是老板的意思。

这之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1934年底他参加了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化装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整个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变”后，再次由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我再一次遇到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间的1937年7月中旬。当时，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已成死结，但是，由于1933年到1935年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李竹声、盛忠堂的叛变，上海和长江南北的党组织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等保存下来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战的党员，由于他的到来，才找到联系和团结。他熟悉上海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经他和李克农同志研究，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一方面把他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党员与必须长期隐蔽的工作组织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下的时机，和“救国会”、“各界救国协会”等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人合作，放手组织公开合法的救亡队伍（如“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转入内地和前线工作。同时，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大约是1937年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sup>②</sup>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这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国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谈了，勉强勉强决定由国共双方各出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这一段时间，他在上海躲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亲密真诚的“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句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刘少文<sup>③</sup>同志说的）。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由于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越南、华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这一年，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王朝即将覆灭的那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进、民进……等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刘长胜、刘宁一等同志要在香港电训工作干部；东北解放区外敌机关不断派人和来港电训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连、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

集合。单就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三百五十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们从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家，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北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任解放后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凤、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搞文艺、搞新闻、搞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廖承志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走出，狠狠地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认识李主任？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凤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通俗易懂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干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同回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求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地有点门路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象“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无一不细说。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垒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向解放区送去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假若真是“内奸”，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就不就完全变样了么？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的战友。“潘案”发生，受牵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

## 提高认识，把斗争深入下去！

（上接第一版）

这里需要指出，周志荣等人走私偷税等违法犯法活动主要是在1981年1月以后。在这年的1月，国务院发出严格控制机械设备的（包括电视机、录音机）进口的规定；2月以前，九龙岗海关曾查获走私分部的违禁漏税行为，并曾多次警告和罚款。但是，周志荣等人为了牟取暴利，仍然置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于不顾，继续和不法港商相勾结，采取倒签合同的行为，骗取国家进口许可证，大量进口电视机、录音机等产品。难道能说这是周志荣等人由于缺乏经验而犯的吗？当然不是。这是明知故犯，是为了赚取不义之财而干的违法的事，是和不法港商勾结起来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有的同志说，“周志荣等人走私偷税没有装入个人腰包，不能算作犯罪，顶多是大公小公的问题。”

这种说法也需要澄清。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区分罪与非罪，并不以行为人是公还是私作为个人作标准，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是否触犯了刑律，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危害。如果触犯了刑律，造成了严重危害，就构成犯罪了。在经济领域中通过走私偷税等非法手段牟取的暴利，是用于小集体，还是装入个人的腰包，都不能否定犯罪的成立，只能在量刑上加以考虑。经济领域中的严重违法犯法罪，无论是个人干的，还是以集体名义干的，都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而且后者往往比前者危害更烈。

就深圳分部一案来说，周志荣、徐志良等人打着国家机关、国营企业的旗号，所牟取的不义之财，尽管未装入个人的腰包，但是他们的犯罪行为，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国家对外贸易的管理，扰乱了国内的经济市场，影响了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潘汉年同志肖像

《解放日报》供稿

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五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交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对党的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后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5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二十七年。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早已过时的事了。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列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看到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说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来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资”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也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来的之和我谈文工作那一次，经过老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他。”（“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现在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是埋头苦干，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

注：

- ① 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望山路三德里A11号，所以他们就用“A11”作为刊物的名字。
- ② “八一三”抗战就打响，陈诚、张发奎、罗卓英是淞沪前线三个兵团的指挥。
- ③ 刘少文，当时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我们判断经济领域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一定要站在国家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制概念，而决不能按小集体、小集团的利益蒙蔽了眼睛，更何况大量的事实证明，一些人在“左”的幌子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并不是“两袖清风”，分文不落腰包的，他们大都直接间接地捞取了好处。

在当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这场严肃的斗争中，所以产生诸如此类错误的观点，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有些同志对党的文件缺乏认真的学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看不到打击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二是有些同志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往往只看见现象不看本质，因而被某种假象所迷惑，不自觉地犯为罪分子辩护。三是有的人本身也不干净，从中占了便宜，因而极力为犯罪分子开脱。为了保证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健康地深入发展，对这种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决不能听之任之，而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正面的思想斗争加以解决，对其中某些违反党纪、政纪的同志，还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自党中央下达《紧急通知》和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以来，由于各级党委重视，这场斗争取得了初步的成绩。通过这场斗争，沉重打击了一大批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分子，保卫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四化建设，保证了我们的国家更好地沿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前进。

但是，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繁重、复杂的，我们决不能有任何松劲的思想情绪，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全党一定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站稳立场，毫不动摇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重要保证。”我们相信，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全党同志一定会再接再厉，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更加深入地进行下去。



# 为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一条途径

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提出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要着重解决五个问题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国家有关部门最近提出,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要着重解决五个问题: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关系;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加强领导。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为此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国务院已经向各地区、各部门批转了这个报告。

报告分析了我国工业经济责任制发展的过程和取得的显著效果,指出,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的实践。实践证明,它对于促进国民经济调整,争取实现财政状况的好转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为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到一条途径。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的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经济责任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 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报告说,实行经济责任制,首先要明确企业对国家的经济责任,并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企业的责任,首先是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企业要健全企业,勇于承担任务,不仅要完成国家利润指标,而且要完成产量、质量、品种、消耗、成本等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要努力提高计划的科学性,搞好综合平衡,逐步做到各项计划指标互相衔接,由一个部门下达。

报告说,根据不同的计划管理形式,企业应有不同程度的计划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对指令性计划要严格执行,发现计划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符合,或者由

于主要原材料、能源供应不足,企业经过努力仍然解决不了时,可以向上级计划部门提出修改计划的建议,经过批准,进行调整。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市场需要和能源、原材料的可能,挖掘生产潜力,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弥补计划的不足。在执行指导性计划时,企业有权根据市场的供需情况,制订具体计划,报计划主管部门备案,组织生产。对国家规定市场调节的商品,允许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自行安排生产,但必须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不论实行哪一种计划管理形式,产销各部门之间,都要逐步建立合同制,严格按合同办事。

报告说,为了把经济搞活,必须给企业一定比例的产品自销权。除国家特殊规定不准自销的产品外,包括统配、统购包销和紧缺产品,都要允许企业有一定比例的自销权。自销产品的比例,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不同产品,分别研究确定。自销产品的价格,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物价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

## 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根据一些先进单位经验,报告提出抓好下列工作,以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一)根据国家宏观计划的要求和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制定一个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奋斗目标,层层落实到科室、车间、班组直到个人。(二)切实加强各项基础工作和专业管理工作,特别要健全定额管理、计量检验、原

始记录和考核制度。(三)整顿奖励制度,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克服奖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真正使奖金起到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用。要做到限额不突破,单位不拉平,个人能升降。(四)认真整顿劳动组织。(五)加强民主管理,依靠广大职工当家作主办好企业。(六)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同高度的政治责任心结合起来。(七)调整好领导班子。这是搞好企业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决定性条件。

## 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关系

报告强调,在分配上,一定要做到国家多收,保证国家适当集中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企业和职工所得的增长,要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来实现。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企业目前实行的利润分配办法、留成比例、包干基数进行一次整顿。通过整顿,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有较多的增加,支持重点建设,又要保护企业正当的利益,使之有条件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善职工生活。

报告说,对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要进一步贯彻勤勤节约的原则。在国家规定的总的留成水平范围内,各主管部门对那些特别努力、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经营好、对国家贡献大的企业,利润留成比例可以适当高一些;经营差的企业,留成比例就应低一些。

## 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

报告说,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对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报告说,企业生产发展基金、更新改造资金的使用,应当坚持正确方向,主要用于技术进步、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在奖励基金中,应有一定份额,专门用于奖励对技术进步作出贡献的企业。企业主管部门要制订行业技术改造的规划,指导企业合理使用资金,有计划、有重点、分期分批地搞好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要实行产品的优质优价,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产品,加快技术进步。对分散在企业的结余资金,要研究采取适当的方式调剂使用,促进行业内部重点项目的改造。银行贷款也应优先安排用于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

## 统筹规划,加强领导

报告最后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完善经济责任制工作中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按照各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确定它们在生产、流通、分配等环节上的自主权限,提出不同的要求。首先要重点抓好大型企业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工作,一个一个大地研究落实,制定规划,使它们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加速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尽快地把潜力发挥出来。同时,对一部分小型企业,可以实行上交所得税、自负盈亏。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继续学习首钢的经验,同时也要总结推广本地区的经验,以点带面,推动经济责任制向前发展。要力争在今后两三年内,使工业经济责任制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

# 杨得志设宴欢迎阿曼副首相法赫尔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阿曼苏丹国负责国防和安全事务的副首相法赫尔·本·泰穆尔一行。

杨得志在会上首先讲话。他赞扬阿曼领导人在卡布斯苏丹的领导下奉行和平中立的非结盟政策,主张阿拉伯团结,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其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他说,阿曼政府和人民不畏强暴,谴责霸权主义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渗透和扩张,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阿曼人民和军队坚决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加强自身的防

务力量,取得了显著成果。杨得志谈到中阿关系时说,自建交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交往不断增加。我相信,法赫尔副首相这次访华,必将为增进中阿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积极的、有益的贡献。

法赫尔副首相对于他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表示感谢。他说,这次访问是在中阿两国之间的关系和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希望两国间友好亲密的关系与日俱增。法赫尔对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并祝愿中国不断繁荣发展。他还转达了卡布斯苏丹以及阿曼解放军的敬意和问候。有关方面负责人温业华、徐信、张彤等和阿曼驻华大使阿瓦德·巴德尔·尚法里出席了宴会。

今天上午,法赫尔副首相出席了我国国防部举行的欢迎仪式。在杨得志总参谋长陪同下,法赫尔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队仪仗队。随后,杨得志同法赫尔进行了会谈。法赫尔还在今天上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 宋双游览长城定陵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总理宋双由外交部顾问韩念龙陪同今天游览长城、定陵。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黎巴嫩驻中国大使巴撒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柯玛蒂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黎巴嫩独立日。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等应邀出席。

国家民委副主任杨东生同志,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杨东生同志(藏族),因病医治无效,于1982年11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根据杨东生同志的遗愿,他的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

小平同志送了花圈。万里、仲勋、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刘澜涛、帕巴拉·格列朗杰等送了花圈,并在杨东生同志病重期间前往医院看望,11月20又到北京医院向杨东生同志的遗体告别。送花圈和到医院看望的还有李维汉同志。

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杨东生同志生前友好杨静仁、阴法唐、天宝、扎西旺徐等送了花圈。

在北京的西藏自治区党政负责人郭锡兰、巴桑、宋子元、张增文、陈竟波、李本善,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西藏驻京办事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等单位的各族干部,今天前往北京医院向杨东生同志的遗体告别,并向杨东生同志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民委、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四川省金川县的中共县委、县人大会等,向杨东生同志单位送了花圈。

杨东生同志是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金川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在红五军团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第四军四师、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工作;全国解放以后,任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工委副书记、西藏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曾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十二大候补代表和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杨东生同志是我党的忠诚战士,是藏族的革命先驱者之一。在党的领导下,他坚贞不渝,艰苦朴素,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竭尽了毕生精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特别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杨东生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作风正派,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同群众保持了密切联系。

杨东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我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民族工作和西藏工作的一大损失。

西藏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杨力明、阴法唐、杨岭多吉、热地、张向明、胡宗林、王运祥、杨宗欣、桑顶·多吉帕姆、拉敏·索朗伦珠、江中·平措次旦、扎西多吉、盖玉克、吉普和各族各界群众,17日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持,在杨东生同志遗像前悼念他的逝世。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黎巴嫩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柯玛蒂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黎巴嫩独立日。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等应邀出席。

国家民委副主任杨东生同志,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杨东生同志(藏族),因病医治无效,于1982年11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根据杨东生同志的遗愿,他的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

小平同志送了花圈。万里、仲勋、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刘澜涛、帕巴拉·格列朗杰等送了花圈,并在杨东生同志病重期间前往医院看望,11月20又到北京医院向杨东生同志的遗体告别。送花圈和到医院看望的还有李维汉同志。

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杨东生同志生前友好杨静仁、阴法唐、天宝、扎西旺徐等送了花圈。

在北京的西藏自治区党政负责人郭锡兰、巴桑、宋子元、张增文、陈竟波、李本善,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西藏驻京办事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等单位的各族干部,今天前往北京医院向杨东生同志的遗体告别,并向杨东生同志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民委、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四川省金川县的中共县委、县人大会等,向杨东生同志单位送了花圈。

杨东生同志是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金川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在红五军团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第四军四师、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工作;全国解放以后,任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工委副书记、西藏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曾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十二大候补代表和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杨东生同志是我党的忠诚战士,是藏族的革命先驱者之一。在党的领导下,他坚贞不渝,艰苦朴素,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竭尽了毕生精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特别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杨东生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作风正派,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同群众保持了密切联系。

杨东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我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民族工作和西藏工作的一大损失。

西藏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杨力明、阴法唐、杨岭多吉、热地、张向明、胡宗林、王运祥、杨宗欣、桑顶·多吉帕姆、拉敏·索朗伦珠、江中·平措次旦、扎西多吉、盖玉克、吉普和各族各界群众,17日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持,在杨东生同志遗像前悼念他的逝世。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黎巴嫩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柯玛蒂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黎巴嫩独立日。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等应邀出席。

康克清等观看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

本报讯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文化部部长朱穆之、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办公室主任荣高棠、全国剧协副主席廖沫沙等,在北京工人俱乐部观看了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南方片)在北京演出的剧目《宋庆龄和孩子们》(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演出)。

演出结束后,康克清同志等登上舞台会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演员。少先队员向康克清同志和扮演宋庆龄的演员献了红领巾和鲜花。

上海市昆剧团来京公演

本报讯 记者易帆报道:上海市昆剧团来京公演。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观看了仲勋、谷牧、周扬、朱穆之、周巍峙、刘导生等观看了首场演出。

上海市昆剧团中,八十一岁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上海市昆剧团团长俞振飞,在《白蛇传》中扮了不畏权势、醉态朦胧的李白,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中青年演员华文英、计镇华、梁谷音、刘异龙、王紫芳、陈同甫等,分演《评弹》、《双下山》、《挡马》等戏中扮演的角色。他们精湛的技艺、深厚的功底和良好的台风受到了首都各界和观众的深致好评。观看首演的还有曹阳、吴作人、冯牧、赵寻等。

评弹《真情假意》

上海评弹团曾于1961年在北京演出过,在阔别二十一年后的今天,他们带着老传统节目和新创作的优秀作品再次来到北京演出,受到了首都听众的赞赏。

左图:上海评弹团演出中篇评弹《真情假意》。该剧在今年3月全国曲艺(南方片)汇演中,获创作、演出一等奖。

建中、蒋泽摄影报道

乔石会见南斯拉夫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联部部长乔石今天下午会见并宴请南斯拉夫新任驻中国大使奥布拉多维奇。

卢嘉锡宴请印度国家科学院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今晚设宴欢迎印度国家科学院院长梅农教授率领的印度国家科学院代表团。宾主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

# 查清“深圳分部案件”罪犯走私偷税牟取暴利事实 深圳司法部门依法逮捕周志荣徐志良

告和罚款。但周志荣等人置若罔闻,不仅变本加厉继续与不法港商合谋走私偷税,而且在国务院1981年1月发出严格控制机械进口(包括电视机、录音机)进口的规定后,采取倒签合同日期的欺骗手法,骗取国家进口许可证。经查证,已经执行和生效的倒签合同就有84份,其中电视机55万多台,收录机347万多台,录音带135万盒,计算器2万台,总值达4,750万美元。这些进口产品销售到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共460个单位,冲击了我国同类产品市场,影响了民族电子工业的发展。

周志荣等还违背国家外汇管理条例,非法买卖外汇1,600余万美元。他们非法进口、复制的15万盒录音带,已销售到15个省、市、自治区10万多个,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香港、台湾的黄色歌曲,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

周志荣等人先后低价销售给原机部和其他关系户单位的有电视机730多台,收录机、录音机800多台,有声道和空白录音带19,000多盒,使国家损失近20万元。在这些电视机、收录机等中,有一部分是周志荣等人为了便于进行经济犯罪活动,采取变相行贿等手法低价销售的。有些人得到周志荣等人的好处后,或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们的违法

选择 (上接第一版)

华敏芳很重视从政治上看人,但她的“优势”还在于能从业务上全面考察干部。真正德才兼备的干部她都能发现、提拔上来;不大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她也能识别出来。一次,一个下属厂需要配备一名生产副厂长,各方面推荐了两名人选,哪位更合适,一时难以确定。华敏芳经过考察,认为其中一位工作很积极,也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技术理论水平比较低。虽然提拔他的呼声比较大,实际上将难以挑起主管全厂生产技术工作的重任;另一位工程师,呼声小一点,各方面条件却比较成熟。党委经过认真讨论,下决心任命后者为该厂生产副厂长。

这次推选和任命副厂长,被人称为华敏芳的“第一次冲击波”。它推动那些光有实践经验的,主动去学习科学技术;推动一部分确实“力不胜任”的同志主动让贤。

华敏芳和干部处同志一起,对全公司科以上干部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调查,对所有技术干部按专业进行摸底,分别建立了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的档案卡。从此,提拔干部不再是凭领导干部个人印象、不是靠几个人拍胸脯了。

今年3月,华敏芳同志被调任北京市组织部副部长后,首钢党委又提拔了两位工程师作干部处正副处长。华敏芳虽然走了,但首钢干部和技术工作新套没有变,限于篇幅不作介绍了。这里提供一组数字,请读者对体制改革的效果作出自己的判断:

同1977年相比,目前首钢厂(处)级干部中,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由28%上升到54.1%,在基层班子党政一把手手中占62.1%;有工程师等技术职称的由23.2%上升到52.4%,在党政一把手手中占65.2%。中青年干部,特别是中青年技术干部,纷纷走上领导岗位。1980年以来,共举办5期训练班,共培训716名中青年干部,从前4期结业学员中,已提拔科级干部194名,厂(处)级干部11名。去年以来,新提拔的厂(处)级干部,78.3%是中青年技术干部。目前,中青年技术干部,在厂长中占81.8%,在生产副厂长中占93%,在厂一级正副党委书记中占38%。

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干部工作时,多次讲到“知人善任”。何谓知人?何谓善任?从首钢党委和周冠五同志的胆识和作为,不是可以窥见端倪了吗?

犯罪活动开绿灯;或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辩护,给这起重大走私案的调查工作增加了困难和阻力。

周志荣还接受了不法港商的港币、人民币、手表等。

周志荣等人的走私偷税等违法犯罪活动,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使不法港商发了大财。他们帮助港商进口和推销大量质量最低的电视机、收录机等组件和零部件,有很多是不配套的,至今还积压在仓库里。仅据粤省7507和南京无线电厂等五个单位统计,他们通过深圳分部与不法港商签订16份合同,进口电视机、收录机38万架,其中有就有27万台因欠缺零部件不能装配,使这几个单位受到损失。

中央领导同志对“深圳分部案件”十分重视,作过重要批示,责成中纪委进行彻底追究。中纪委坚决执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去年12月,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陆续查出了不少严重问题。对此,本报已于今年3月11日、4月22日作了两次报道。今年5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材料科开始立案侦查,并对周志荣、徐志良进行监视居住,又经过5个月的查核,取得了大量确凿的证、物证,终于查清了周志荣等人走私偷税等违法犯罪事实,确认已构成重大走私犯罪。





蜜横无理的要求

以色列侵略军撤出黎巴嫩,是缓和黎巴嫩局势的关键。但是,贝京当局正以极端蛮横无理的态度,为拒绝从黎巴嫩撤军制造借口。

据报道,以色列最近向黎巴嫩提出了新的撤军条件,包括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领空和领海拥有监督权;以色列在贝鲁特南部巴鲁克山头上建立雷达站;黎巴嫩市场向以色列产品开放等等。以色列提出这种要求,分明不是在该撤军,而是要把黎巴嫩变成它的附庸国或殖民地,因此理所当然遭到黎巴嫩政府的拒绝。以色列借口巴勒斯坦问题入侵黎巴嫩,现在它竟然把黎巴嫩当作一个战败国,向它提出损害主权的要求。这种行径充分证明,它入侵黎巴嫩是它整个侵略扩张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它向黎巴嫩提出的无理要求,进一步暴露了它的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

以色列提出这种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能答应的条件,无非是为了它的侵略军可以在黎巴嫩不走,以便破坏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继续霸占和吞并阿拉伯领土。显然,以色列谋求地区霸权的野心不死,中东和平就没有希望。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强硬态度,使它同阿拉伯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以色列的无理要求所摧毁。



伊拉克克沉伊朗哈格岛附近五艘油轮

新华社巴格达11月21日电 据伊拉克通讯社今天援引伊拉克军方的一份战报说,伊拉克军舰和飞机20日晚上在伊朗石油集散地哈格岛附近击沉了5艘伊朗不明的油轮。

战报说,这次袭击是根据封锁伊朗在湾湾的港口的命令进行的,是伊拉克—伊朗战争以来伊拉克空军和海军联合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行动。

哈克希望迅速结束阿富汗的灾难

呼吁联大对阿富汗问题通过更有力的决议

新华社伊斯兰堡11月22日电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说,使阿富汗灾难迅速结束是巴基斯坦的真诚愿望。

他是昨天晚上在卡拉奇为在赴印度尼西亚访问中途经巴基斯坦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宴会上讲这番话的。

哈克总统指出,一切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所必需的不干涉原则在阿富汗受到了践踏。它给遭受侵犯的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在谈到巴、罗两国关系时,哈克总统说,两国的友谊反映在“我们对两国之间最基本的问题”具有广泛一致的看法。

在谈到中东局势时,他表示,巴基斯坦全力支持阿拉伯领导人最近在非斯提出的和平倡议。

阿游击队在喀布尔炸死政府官员和特务十余人

新华社北京电 据西方通讯社16日援引新德里和伊斯兰堡的西方外交人士的消息报道,阿富汗游击队11月11日在喀布尔市连续炸毁阿富汗政府官员、饮酒作乐的3家豪华饭馆、炸死阿政府官员和国家特务十余人。

民東部队又打死一名越军师级指挥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又有一名越南师级指挥官被民柬埔寨部队打死。

广播说,11月6日,越南一辆吉普车在驻扎在磅清宣当县的第44营部开出,在“9·30”水库处遭到民柬埔寨部队袭击,车上一名越南师级指挥官和另外3人被消灭。11月3日在磅清宣当县有一名越南师级指挥官被民柬埔寨部队击毙。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在“柬埔寨人不打柬埔寨人”的口号影响下,正在磅清宣当县雷克以南的达普卡山接受军事技术训练的金边伪军,在上个月有105人开小差返回家乡。

民主也门和阿曼关系改善

朱梦魁

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对阿拉伯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贡献。“海湾合作委员会”发言人说,原则协议的达成“给两国和这一地区的国家提供了和平、安宁和稳定的机会。这样,这一地区的国家就有信心保卫自己的安全与稳定,维护本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排除世界大国以何借口进行霸权主义的企图”。

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后,民主也门和阿曼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反映了双方对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局势和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的迫切性取得了共识。此外,民主也门近年来致力于国内建设,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阿曼改善关系将直接有助于民主也门的经济发展,使之逐步摆脱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阿曼也希望致力于本国的建设,并代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在阿曼半岛南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两个邻国。在历时十五年的严重对立之后,通过谈判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协议。

穆巴拉克同意阿拉法特访问埃及

欢迎阿拉伯国家在时机成熟时同埃及恢复关系

新华社科威特11月22日电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昨天在开罗对科威特《政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埃及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能带着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新方案访问开罗。

穆巴拉克表示,他希望在明年访问美国时能把阿拉法特的方案向美方提出来。

穆巴拉克在谈到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说,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已告结束,埃及已经停止了它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甚至同反对埃及的阿拉伯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宣传战。他说,如果阿拉伯国家认为埃及恢复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埃及表示欢迎。

穆巴拉克呼吁阿拉伯国家接受美国总统里根在今年9月1日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方案中的积极因素。他说,他注意到美国的建议和非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建议之间的分歧。但是,他认为,如果阿拉伯的建议没有外部的支持就难以取得进展。

埃及外长向巴解组织通报访美情况

巴解领导人说埃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积极

新华社开罗11月21日电 埃及副总理兼外长阿里今天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达贾尼进行会谈,通报了埃及最近访问美国的情况。

据埃及官方人士透露,阿里在访问美国期间,向美国转达了巴勒斯坦人对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意见。他向达贾尼介绍了他在美国就推动和平进程以及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有关各方参与进程的问题进行接触的成果。

达贾尼在会谈后对记者说,埃及最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进行的接触是“积极的和有意义的”。他认为,埃及的目标是不仅根据美国的方案,而且还根据国际准则来实现中东公正的和平。他说,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埃及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起着一种补充的作用。

达贾尼指出,美国要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不久将举行会议,讨论新的事态发展以及巴解组织最近与各方接触的情况。

他在谈到约旦和巴勒斯坦关系问题时说,它们可能采取一种联邦的形式。他还说,巴解组织和约旦正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

阿萨德总统强调

作好准备对付以色列侵略

新华社大马士革11月21日电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以色列企图无端地向阿拉伯祖国扩张,并企图加以完全控制。因此,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作好对付侵略的一切准备。”

据此间报纸报道,阿萨德昨天在叙利亚工会总联合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时说:“如果说敌人过去对我们怀有仇恨,那么在黎巴嫩事件之后,敌人对我们的仇恨就更大。”

约旦国王访问土耳其

据新华社安卡拉11月20日电 约旦国王侯赛因结束了对土耳其的两国国事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安卡拉回国。

侯赛因动身前曾在安卡拉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强调约旦准备在一切领域同土耳其进行合作。

据这里的官方人士透露,昨天土耳其总统埃夫伦和侯赛因国王会谈时,着重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中东形势。

埃夫伦18日晚在欢迎侯赛因国王举行的宴会上宣布,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巴解组织参加未来关于中东问题的谈判。

侯赛因在答词中说,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只有通过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才能实现。

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将如期举行

乍得代表权问题仍未获解决

他说,过去6天来,部长理事会会议一直在讨论乍得代表团的席位问题。有些代表团要求让给乍得派出的代表团与会,而另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应该交给首脑会议解决。他说,“遗憾的是,部长们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他补充说,没有一个代表团正式主张让古库尼派出的代表团出席部长理事会会议。他说,不论由非统组织最高机构或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都是可能的。

到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增加八倍

国际地方当局联盟呼吁各国解决城市人口激增造成的问题

据新华社日内瓦11月19日电 由国际地方当局联盟组织的大城市问题讨论会昨晚在这里结束。讨论会呼吁世界各国的地方当局解决急剧城市化的问题,改善居民生活。

来自25个国家、39个城市的142名代表参加了为期3天的讨论会。他们就城市住房、交通、人们和就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联合国人类居住问题中心执行主任拉马拉钱德在会上说,今后20年内,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普遍满足目前城市人口的生活问题,而且将面临新增的10亿城市居民居住住房、基本设施和各种服务问题。他还说,到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增加8倍。

国际地方当局联盟成立于1913年。前两次会议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在马尼拉和慕尼黑举行。

国际地方当局联盟最近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了一个题为“城市人口激增”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城市人口激增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呼吁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以解决城市人口激增带来的各种问题。

11月的北京,已是霜寒大地,而曼谷却依然是骄阳似火,一片翠绿。彭冲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12日下午飞抵曼谷时,泰国下议院议长汶汶、沙瓦和许多泰国朋友到机场欢迎。

当天晚上,泰国国会会长哈林·安沙军在议会俱乐部举行欢迎宴会。哈林议长和彭冲副委员长在宴会上发表热情洋溢讲话,一致认为发展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益于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他们强调,柬埔寨问题是本地区动乱的根源,只有解决了柬埔寨问题,东南亚才有真正的和平可言。泰国总理炳·廷素功暖于访华前夕,在总理府接见并宴请了彭冲副委员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炳总理说,“我们两国的友谊不断加强,副委员长的来访,将使这种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代表团在泰国所到之处,无不受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在泰国北部的南部府,主人以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康莺”晚宴招待代表团。“康莺”是泰国北部人民专门招待远来客人的传统晚餐。代表团全体成员,戴着花环,席地而坐,品尝着泰国的风味食品。在宴席上,南部府总督邀请彭冲副委员长一同跳泰国的“南旺”舞。和着轻松愉快的旋律,全体团员与泰国朋友翩翩起舞,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参观水上市场,使中国人大代表团更加深入地了解泰国人民的生活。这天早晨,彭冲一行驱车来到离曼谷80公里的叻丕府丹沙道县。这里位于夜功河流域,270多条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水路交通四通八达。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水上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每天,当东方鱼肚白时,各地农民就头戴竹笠,划着一叶扁舟,载满香蕉、椰子、桔子、豆角、冬瓜、西红柿等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市场。市场上人头攒动,热闹异常。中国人大代表团的到来,使这里更增加了热烈的气氛。一位经营手工工业品的人,双手捧着一把佩刀送给彭冲副委员长,并说:“按照泰国的习惯,一般是不将利器送人的,因此被选中要献出一铁线,表示这是‘买’下的。”彭冲副委员长马上拿出两块钱,笑着对这位商人说:“按照中国的习惯,好事成双,因此,我用两块钱来‘买’了。”在场的泰国朋友都笑起来。还有一位女老农,拿着泰国工艺品等候在代表团进餐的码头。她对记者说:“这些东西是我自愿送给中国人民的。虽然这些东西不值多少钱,但这是我们的诚意。前两天,我听说中国人大代表团要来,心里非常高兴。现在我们的总理正在中国访问。这样经常往来,很好!”代表团团员林福福同志谈到了访问时,“我们感觉就象到了自己的家。”这是全体代表团团员们要说的话。

明媚的风光,勤劳的人民,好客的主人,友好的情谊,给中国人大代表团全体成员留下了美好的记忆。10月19日中午,彭冲副委员长一行离开曼谷前往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继续访问。当代代表团全体成员同前来送行的主人依依话别时,大家相约,气氛友好,情谊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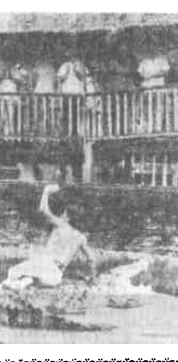
泰国人民要起来常往。此情此景,使人想起了哈林议长在答辞宴会上的最后一席话:“泰国议会曾经接待过许多代表团来访问,但是,我们并没有认为彭冲阁下是来客,我们把你们当作亲戚。”



亲戚越走越亲

本报记者 王荣久 杨群

记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泰国



彭冲副委员长一行观看鳄鱼表演。

杨群摄

中国土耳其经济合作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安卡拉11月20日电 中国土耳其经济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19日结束时草签了一份备忘录,决定增加两国的贸易,并在水利和火力发电方面加强合作。

根据备忘录规定,土耳其将向中国派出水稻种植、生丝、陶瓷及木材和地质勘探专家。中国将向土耳其派出研究牛奶工艺、畜牧业特别是安哥拉羊和安哥拉兔饲养以及棉花和烟草生产考察队。两国同意在向南第三国提供承包服务方面进行合作。

中国代表团在参加联合国联盟总理事会期间,于今天去土耳其布兰布市访问,定23日返回。

庆祝中扎关系正常化十周年

我驻扎伊尔大使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金沙萨11月19日电 为庆祝中国和扎伊尔关系正常化十周年,中国驻扎伊尔大使李善一今晚在官邸举行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扎伊尔外交事务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的代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等。

我帮助斐济开发稻田议定书签字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苏瓦消息:中国帮助斐济开发稻田的议定书今天在斐济首都苏瓦签字。

议定书规定,中国将以贷款的形式资助斐济政府开发大约60公顷稻田,并提供小型农业机械和有关水稻种植的特专利技术。中国驻斐济大使周志伟和斐济农业和渔业部长苏尧特、玛氏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捷总统结束对奥地利的访问

捷总统结束对奥地利的访问,于19日返回布拉格。捷总统胡萨克在布拉格机场受到欢迎。胡萨克在布拉格期间,曾与奥地利总理克劳斯举行会谈,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声明还提到,两国政府已同意在维也纳举行会谈,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







